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术丛书

中日古典文学

比较研究

张晓希 等著

丛书主编：修刚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术丛书

主编：修 刚

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

张晓希 等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 / 张晓希等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310-03147-4

I. 中… II. 张… III. 古典文学—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 I206.2 I313.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898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4 插页 329 千字

定价:2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言

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汲取、模仿、消化、吸收到最后形成具有自己民族特色文学的过程。

日本最早的上代文学产生于奈良时代(710~794)。自公元3世纪起,中国的汉字、汉诗文陆续传入日本,经过长时间的消化,日本人借助汉字创造了史书《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

《古事记》再现了日本远古神话、传说,《日本书纪》以史实为主,但其中不乏神代及人皇时代的传说、说话、歌谣等文学要素,二者完成了由口诵文学向文字文学的转变。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是三十余年后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和和歌集《万叶集》(759)。《怀风藻》是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收入了皇室、贵族、僧侣等上流社会64位文人的约120首汉诗,其中以侍宴、应诏的五言诗居多,可以明显地看出模仿中国六朝诗和初唐诗的痕迹。《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抒情诗歌总集,收录了4496首和歌,作者上至天皇、皇后、贵族、官吏、僧侣,下至农民、士兵、歌女、乞丐,几乎包含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其题材内容涉及广泛,分为杂歌、相闻和挽歌、譬喻歌、戍边歌和东歌等。《万叶集》向来享有“日本之《诗经》”的美誉,无论是和歌的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日本文学的源泉,它为后世多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从《万叶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本书第一章以万叶

第一期代表歌人额田王和与其同时代的中国唐代女诗人上官婉儿为题，考察了二者作为中日两国宫廷才女的诗歌创作活动，作品的内容、特点、思想性、诗风的异同。在万叶歌人中，《万叶集》中收录数量最多、受中国文学影响较大的还有第四期的代表歌人大伴家持。其歌风纤弱绮丽、善于抒情，带有下一个时代《古今和歌集》的纤细风格。“大伴家持和歌的特色及历史意义”则从对空间和时间素材选择，以及大伴家持感伤、忧郁交错的复杂心情两方面考察了大伴家持歌风的特征。《万叶集》的和歌不仅仅包括皇室、贵族的作品，还有远离故乡去戍边的戍边歌。边塞文学是中日文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社会作了广泛的透视。“中日边塞诗歌的比较研究”以王昌龄和大伴家持的作品为中心，考察了两人作品从军出塞、保国戍边的军旅生活和征夫思妇相思之情的主题，此外，还研究了中日边塞诗歌的同源异流、述志与述怀、审美意识、思想性等方面的差异。

公元794年，恒武天皇由平城京（今奈良）迁都于平安京（今京都），此后大约四百余年间，平安京成为日本贵族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平安前期，中日文学交流频繁，汉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诞生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三部敕撰汉诗集，迎来了平安朝汉文学的鼎盛时期。平安后期，随着唐朝的灭亡，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从而结束了讴歌唐风的历史，日本的汉文学逐渐走向衰退。由于摄关政治体制的形成、假名文字的发明和普及，出现了以宫廷生活为舞台的和歌、物语、随笔、日记文学等日本独特的文学体裁，而活跃在这些创作领域的作者大多是以后宫女官为主体的贵族女性作家群体。她们的文学创作是平安时代的一个亮点，其文学作品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至此，用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日本文学逐步被假名文学所代替，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也由直接影响转为间接影响。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日记文学是平安女性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第二章的“中日日记与日记文学的比较研究”从

中国日记的起源、流变以及日记在日本的演变入手,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平安时期日本女性日记文学形成和发展的特性,同时通过对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几篇文学日记的分析,论述了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艺术特点,以及这些作品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而归纳出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及历史局限性。“中日日记文学特色的研究”从微观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两国日记文学的代表作《吴船录》与《土佐日记》,从日记文学的写实性、文学性以及思想性等方面研究了中日两国日记文学的特色。在韵文方面,平安四百年中,和歌尤为兴盛,私家集不计其数,仅是敕撰和歌集就有21部,而《古今和歌集》便为其滥觞。《古今和歌集》的作品偏重理智,注重精雕细刻,有较高的艺术性。歌人们汉文学造诣很高,以六歌仙最为突出。小野小町是其中唯一的女歌人。“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与鱼玄机”系作者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闺怨诗的角度,对小野小町与中国唐代著名女诗人鱼玄机的比较和考察。闺怨诗不仅体现了诗歌的技巧性,同时又寓理性于抒情之中,此外,在思想和经济上受束缚的女性为失去爱情而悲叹怨恨和对不幸命运的哀伤,揭示了闺怨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本质特征。

中世文学(1192~1603),在“公家”(朝廷)和武家文化的对抗中向前发展。“公家”文化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和歌文学上。中世的和歌不仅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其文学理论也发展到一定高度。作为中世文学理念的中心,“幽玄”不仅贯穿于中世的诗歌、小说、戏曲、随笔等领域,其影响力也波及整个中世的艺术、文化、生活等方面。“‘幽玄论’与‘神韵说’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幽玄的源流以及在日本的演变过程,并将中国的诗论中与“余情、幽玄论”十分接近的一个审美创造理论“神韵说”与之比较,从美学的角度考察了二者的渊源、本质及艺术特色,探讨了从中国的诗论与诗歌创作中寻求对日本和歌进行规范化节律制约的可能因素。中世文学中备受瞩目的还有说话文学。“说话文学受原典影响及变异方法”是以《今昔物语集》第十卷为中心,深入考察了日本说话文学的内容、

形式和文体等方面对中国文学和佛教原典的吸收、消化以及创新的过程，得出了由于日本文化的融合性、社会构造的复合性以及日本民族的同一性使形成日本文学对外来文学的吸收和改变的体系成为可能的结论。中世因战乱不安的现实还产生了隐逸文学。“中日隐逸文学的比较研究”即在考察日本的隐逸思想在接受外来思想的影响过程中，以外在的接受背景和内在的文化传统、审美意识等互为条件，从而形成在自觉层面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机制。

近世文学（1603～1868）产生于工商业迅速发展，町人资本大量蓄积、在经济上开始掌握实权的江户时代。这时的日本文学思想开始出现两条相互穿插、起伏交错的主线。一条是以儒教为背景的武士阶层的理想主义，另一条是平民阶层追求自由、自然的现实主义。日本文学开始从贵族的“雅文学”转向平民大众的“俗文学”，产生了写实性、平民化、娱乐化的新型文学。而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也与当时中国明代思想和小说的影响密不可分，描写町人生活的作品层出不穷，追求人性解放、反映人的欲望的町人文学登上了文学舞台。“17世纪初期中日商人的金钱道德观”以“三言二拍”与《日本永代藏》为中心，探讨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冲击人们的传统道德观，两国商人冲破了当时社会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始思考自身价值，产生了不同于其他阶级的功利性道德观念；当时中国白话小说受到日本文人和学者的喜爱，并且被创作成一种翻案小说受并到读者的欢迎。“《剪灯新话》与《雨月物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两篇作品的分析对比，考察了作者如何将中国的故事素材与日本本土传统糅合处理，运用日本的审美意识融会贯通，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文学主题和人物形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出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自由思想，反映市民生活状态的小说。“《金瓶梅》与《好色一代男》中的商人思想”探讨和研究了中日商人的社会地位、身份观和爱情观，虽然社会背景和审美理念存在差异，但两国的市民身份观和爱情观都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思想，追求人性解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觉醒意

识。

近世文学也是“俳谐”的黄金时代，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直到“俳圣”松尾芭蕉登上俳坛，才使俳谐真正成为一种具有艺术真髓的文艺形式。“芭蕉俳谐的‘风雅之诚’与‘不易流行’”对芭蕉最重要的两个文学理念——“风雅之诚”与“不易流行”的本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不易流行”是“风雅之诚”之本，若将“诚”视为“不易”，那“流行”则是“不易”的阶段。芭蕉逝世后，俳坛发生分裂，俳谐趋于庸俗化。与谢芜村继“俳圣”松尾芭蕉之后成就最为突出。他在天明时期（1781～1789）的“蕉风复兴”运动中，秉承芭蕉的俳谐精神并有所创新，开创了不同于芭蕉“古雅”风格的俳风，独辟出富于浪漫色彩的俳谐新境界，拓展了俳谐的情趣空间，为俳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谢芜村俳谐的多样性”和“从绘画的角度看王维的汉诗与芜村的俳谐”则从汉文学情结、怪异情趣、古典情趣、绘画印象等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芜村俳谐清新浪漫的诗情、丰盈艳丽的色彩及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探究了芜村在艺术上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对日本古典文学的传承以及时代对其思想的影响，从而透视出芜村艺术背后的文化背景。

纵观日本古典文学史，可得出如下结论：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形成，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风土和复杂的环境，与文化宗教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同时构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考察日本文学思想、思潮及其源流美意识，离不开民族性格及其形成的历史、风土的基本要素。这种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培育成的日本文化存在构成复合型的可能性。这种文化和民族性格为日本民族提供了外来思想和文化传入的良好环境，使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创造自己民族文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挪用移植外来文化中的全部因素，而是有选择地取舍，并形成了使外来文化转化成为自身养分的内在机制，形成了有独特民族特质的文学体系。

本书沿着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选取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

作家作品，通过比较分析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通过文学文本的审美形式来阐释其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价值，总结了日本古代文学引进外来文学形式、素材和观念并与本土文学互相交融的过程，展现了日本文学以传统为根基，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学融合而成的历史。

前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上代文学研究	1
大伴家持和歌的特色及历史意义	3
宫廷才女——上官婉儿与额田王	45
中日边塞诗歌的比较研究	
——以王昌龄和大伴家持的作品为中心	74
第二章 中古文学研究	95
中日日记与日记文学的比较研究	97
中日日记文学特色的研究	
——以《吴船录》与《土佐日记》为中心	122
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与鱼玄机	155
第三章 中世文学研究	173
“幽玄论”与“神韵说”的比较研究	175
说话文学受原典影响及变异方法	
——以《今昔物语集》第十卷为中心	187
中日隐逸文学的比较研究	211

第四章 近世文学研究..... 231

17 世纪初期中日商人的金钱道德观

——以“三言二拍”和《日本永代藏》为中心..... 233

《剪灯新话》与《雨月物语》的比较研究..... 252

《金瓶梅》与《好色一代男》中的商人思想..... 269

第五章 俳谐研究..... 295

芭蕉俳谐的“风雅之诚”与“不易流行” 297

与谢芜村俳谐的多样性 332

从绘画的角度看王维的汉诗与芜村的俳谐 362

后 记..... 383

第一章

上代文学研究

大伴家持和歌的特色及历史意义

一、繁荣与动摇交错的时代

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向来享有“日本之《诗经》”的美誉。其和歌题材涉及面广,作者亦十分复杂。但就总体而言,《万叶集》的歌风是由简单古朴向优美雅致,由朴素向纤细,由“万叶”歌风向“古今”歌风过渡的。特别是到了大伴家持的前一个时期,即以大伴旅人、山上忆良、山部赤人等为代表的第三期,迁都奈良后的贵族官僚们在安定闲暇的城市生活中,情感亦开始变得纤细,且诗风极尽繁杂;另一方面,由于诗集的作者十分广泛,几乎囊括当时日本各阶层人物,从而出现了个性成熟的多彩歌风^①。

到了以大伴家持为代表的第四期,诗风中灿烂多彩的个性美逐渐衰微,开始走向柔弱纤细。一方面,在素材上对空间和时间的关注更加细致;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不安和动乱产生了感伤、忧郁的心情,素材和感情融合的结果,使得歌风更加纤细。大伴家持

^① 久松潜一编:(1977)《增補新版日本文学史 上代》第489~492页。久米常民:(1970)《万葉集の文学論的研究》第372~375页。

的歌风正反映了这个变化时期的特点。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与大伴家持所处的时代背景、出身和经历有很深的关系。作为万叶诗人的大伴家持，同时兼任着奈良朝贵族官僚及大伴家族家长的身份。在奈良朝后期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持有双重身份的大伴家持，一方面过着贵族文人的风流生活，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时代的动乱及大伴家命运的起伏，难免不安和忧郁。这种既表面风光又暗藏危机的生活，成为他和歌创作的基础。

作为日本最大的抒情诗集，《万叶集》和歌的吟咏场合也十分复杂，男女求爱的“歌垣”、送别逝者的葬礼、天皇出巡等，都是和歌创作的重要场所。而随着律令的制定、古代国家的完备、平城京的建设、大陆文化的传入和固定，和歌创作的场合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天皇行幸从“国见型”^①向“游览型”^②转变，从而出现了新的行幸从驾和歌^③；在宫廷或贵族官僚之间，出现了歌咏君臣或主宾和乐的宴席歌，等等。

据《家传下·藤原武智麻吕传》记载，到了奈良文化最繁荣的天平时期，国家兴盛，天下太平，京城繁华美丽，学问百家争鸣。贵族官僚们应着各个节日，在建有临泉山池的庭园里设宴，一边欣赏美丽的四时景物，一边或君臣或同僚或友人之间觥筹交错，互作诗歌为乐。在这种当时十分风行的宴席上，吟歌作诗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如果和歌离开了宴席，其大部分的生命也会消失。正如菊池威雄认为的，在平安时代歌会等活动出现之前，“培育出和歌的，就是在宴席上生存的和歌的生活史”^④。家持就曾多次参加各种公私宴席，并吟咏了大量和歌。因此，在评价其歌风的形成和成熟时，是不能离开宴席这一重要的和歌创作场合的。

家持的和歌当中，有明确记载的在宴席上所作的最早和歌，是

① 天皇登高来眺望国家的地势、景色及人民生活等的视察方式。

② 天皇外出、巡回视察的方式。

③ 辰巳正明：（1993）《万葉集と中国文学》第627～628页。

④ 菊池威雄：（2005）《天平の诗人 大伴家持》第123页。

天平十年（738）十月十七日“橘朝臣奈良麻吕结集宴歌十一首”最后的第1591首，左注中有“内舍人大伴宿祢家持”字样，也就是说，这是家持成为“内舍人”^①之后所作的和歌。

もみち葉の過ぎまく惜しみ思ふどち遊ぶ今夜は明けずもあらぬ
か（卷八・1591）^②

（惜哉，红叶逝去情；今夜同气同游，但愿无黎明。）

这首歌诉说了对红叶凋谢的惋惜，作者期望与出席宴席的同伴一起游乐的日子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作为和歌来说，这并不能说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却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宴席及宴席和歌的状况。

事实上，这种雅宴在日本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受中国大陆的影响而出现的。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文选》卷三十·杂拟上）的序文中写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在汉诗文的世界里，宴席是非常重要的和歌创作场合，而且同伴们一边欣赏良辰美景一边咏诗被认为是宴席的理想姿态。

《怀风藻》就是在这种大陆文学观念下形成的，序中写道：“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由此可见，开设文雅的宴席，君臣之间咏诗作文游乐之风流行于近江朝。从具体的诗作来看，不仅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侍宴应诏的场合，像长王诗宴那样的贵族官僚之间的文化沙龙也成为重要的作诗场合。另外，如“天皇诏内大臣藤原朝臣、竞怜春山万花之艳秋山千叶之彩时、额田王以歌判之歌”（卷一・16）所示，这种开设雅宴吟歌作诗的风流习惯也影响到了和歌的世界，在宴席上吟咏和歌成为天平时期（729～749）文人的一种风流表现。《万

① 日本律令制中，中务省的官职名称。从名家子弟中选拔而来，担任天皇的杂役或警卫。

② 本文和歌均引自《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万叶集》小学馆1994年。

叶集》中除了很多的侍宴、应诏的歌宴外，以太宰府的梅花歌之宴为代表的贵族官僚之间的歌宴也经常出现。发展到万叶第四期，在宴席上吟咏风流的和歌的习气更加显著了。

大宮の内にも外にも光るまで降らす白雪見れど飽かぬかも（卷十七・3926）

（宫苑之内，处处呈瑞光；白雪纷纷落，饱看不厌长。）

青柳のほつ枝攀ち取りかづらくは君がやどにし千年寿くとそ（卷十九・4289）

（青柳秀枝多，攀来持在手；君家制绶成，以祝千年寿。）

庭に降る雪は千重敷く然のみに思ひて君を我が待たなくに（卷十七・3960）

（天降庭中雪，千重复万重；思君情若此，吾意待君浓。）

3926^①是天平十八年（746）正月群臣到元正上皇的住所去扫雪之时，家持应天皇之诏而作的和歌。通过描写落雪将宫内外映照得一片雪白的情景，表达了对天皇恩宠的感谢和祝贺。正月这一“良辰”，雪这一“美景”，君臣一起宴饮赋雪这一“赏心乐事”，明显就是大陆雅宴的一种体现。4289作于天平胜宝五年（753）二月十九日于左大臣橘诸兄家举行的宴席上，橘家与大伴家持关系密切，因此家持一边赞美折取的柳枝，一边通过以柳枝之常绿性、永久性来祝福橘诸兄健康长寿。下面的3960是家持去越中赴任那年，即天平十八年（746）十一月，为从京城返回的大伴池主举行的“谈丝饮乐”的“诗酒之宴”（卷十七・3961左注）上，家持寄情于零星落雪和海上碧波而作的“相欢歌”的一首，和3926、4289相似，也是一边欣赏眼前的景物，一边表达了对同席的池主的思念之情。

举办兼具“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个要素的宴饮游乐之宴席，赞美当时的景物，渴望达到君臣和乐或者主宾和乐，

① 此数字是以上引文在《万叶集》中之出处，下同。